

# 國寶重器的時代容顏

張 莅

## 談院藏毛公鼎全形拓及題記



觀賞西周晚期〈毛公鼎〉的銘文、形制與紋飾，可以驗證西周的歷史文化。

〈毛公鼎全形拓〉在特定時空中，擔任分身，成為文人雅士交流的對象與平台。院藏〈毛公鼎全形拓〉的名家題記，不僅描述〈毛公鼎〉的收藏經歷，傳達世人對於〈毛公鼎〉的理解進程，也可見清末民初，由學者和收藏家構成的學術網絡，以及當時青銅器研究的關注焦點。

本院所藏西周晚期〈毛公鼎〉（圖

一），以器內壁鑄有五百字的長篇銘文享譽於世，內容記錄周宣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，請託叔父毛公輔佐政務，率領眾臣治理邦家內外之事，並給予隆重的命服，以及豐厚的賞賜物，毛公因之作鼎紀念，命子孫永寶。這段文字不但見證「宣王中興」的歷史，也與傳世典籍《尚書·文侯之命》的

訓誥文體相互輝映，彌足珍貴。

製作時代距今約兩千八百年的〈毛公鼎〉，直至道光年間，才在陝西岐山出土問世。咸豐年間，經古董商人蘇億年聯繫，賣予著名的金石學家陳介祺（一八一三—一八八四）秘密收藏。到了宣統二年，陳氏後人將之轉賣給晚清重臣端方（一八六一—一九一一）。端方歿後，〈毛公鼎〉

被抵押於銀行，經過一段時日，才

於抗戰前進入葉恭綽（一八八一—一九六八）府中。戰亂期間，葉恭綽曾經囑託姪子葉公超（一九〇四—一九八一）護鼎，葉公超曾因此身陷險境。後來葉恭綽因病困窘，〈毛公鼎〉再次進入銀行典押。戰亂結束後，富商陳詠仁贖出〈毛公鼎〉獻為國有，交由當時的中央博物院典藏，



圖一 西周晚期 毛公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清末民初 毛公鼎全形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器通高五三·八公分、腹深二七·二公分、口徑四七公分；器拓採平面丈量，通高五八·五公分、腹深二三公分、口徑五〇公分，兩者尺寸、比例接近，雖有些許誤差，仍見拓片企圖傳達的原器再現。以閱讀銘文為觀看

器物的正向，器拓亦充分展現〈毛公鼎〉的形制和紋飾，主要特徵為器身敞口，半球型深腹，口沿下方飾重環紋、凸弦紋各一道。細節呈現方面，雙立耳略微傾斜往後內斂，以利表達器耳的穿孔造型。處於視線正中的器

毛公鼎

廿五年八月  
高永升題

命案... 卷軸中央為器拓，左右兩旁為銘拓。觀賞〈毛公鼎〉原器，可見腹壁上的銘文以直書整齊排列（圖三），文字行列間隱約有格線，可知當初鑄造時經過縝密的安排。〈毛公鼎全形拓〉的銘拓則呈雙靴狀，乃是符合原器壁的自然弧度，為平面的拓片遷就立體的器形，而造成差異。若觀察器形，〈毛公鼎〉原

毛公鼎全形拓... 此器拓採平面丈量，通高五八·五公分、腹深二三公分、口徑五〇公分，兩者尺寸、比例接近，雖有些許誤差，仍見拓片企圖傳達的原器再現。以閱讀銘文為觀看

此器拓採平面丈量，通高五八·五公分、腹深二三公分、口徑五〇公分，兩者尺寸、比例接近，雖有些許誤差，仍見拓片企圖傳達的原器再現。以閱讀銘文為觀看

隨國民政府遷台，成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。（註一、二）

### 院藏毛公鼎全形拓

〈毛公鼎〉跟隨收藏者歷經時局動盪，今日則以煥然之姿，安穩無虞地公開陳列於本院。觀賞的人潮絡繹不絕，讚嘆銘文與器形之美的同時，卻鮮有人注意，〈毛公鼎〉是如何由眾多的青銅器中，脫穎而出成為國寶。本院藏有〈毛公鼎全形拓〉一幅，記錄了〈毛公鼎〉出土後的流傳故事，以及一百多年間為世人所認識的過程。〈毛公鼎全形拓〉（圖二），為葉氏收藏〈毛公鼎〉期間所作，全幅縱七三·六公分、橫一五二公分，橫披，軸裝。卷軸中央為器拓，左右兩旁為銘拓。觀賞〈毛公鼎〉原器，可見腹壁上的銘文以直書整齊排列（圖三），文字行列間隱約有格線，可知當初鑄造時經過縝密的安排。〈毛公鼎全形拓〉的銘拓則呈雙靴狀，乃是符合原器壁的自然弧度，為平面的拓片遷就立體的器形，而造成差異。若觀察器形，〈毛公鼎〉原

足，以雙白線形成立體的轉折效果，相較於前方兩獸蹄形足的流暢曲線，特別強調了器足朝內面的平切設計。整體而言，全形拓藉由墨色濃淡，營造器身的陰影立面，並利用局部拓疤進行仿真，〈毛公鼎〉線條簡潔，且典雅莊重的形象可謂躍然紙上。

〈毛公鼎全形拓〉擁有精美傳神的銘拓和器拓之外，還留有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學家的題記。卷首為商承祚所題篆書「毛公鼎」，卷末為葉恭綽題：「此器茲歸國有，可云得所。然撫今思昔，不能無感。懷璧之罪，可不慎歟。遐翁。」（如圖二左上題記）卷軸左右兩側及下方的留白處，共有五則題記，由右至左，作者分別為于省吾、孫海波、董作賓、唐蘭、容庚，除董作賓以甲骨文撰寫外，其餘皆以行書留墨。題記皆載「公起先生命題」，說明作題原由，書寫時間最早為民國二十五年八月，可知〈毛公鼎全形拓〉的年代下限不晚於此。

### 青銅器與全形拓工藝

青銅器為商周時期的禮儀用具，



圖六 西周晚期 頌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西周晚期 散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頌壺全形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



圖五 散盤全形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



圖三 西周晚期 毛公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呈現著先秦貴族的生活與文化面貌。漢代時，由於天人感應之說，青銅器的出土被視為祥瑞吉兆。到了宋代，朝廷中央行文治，官方倡導禮教經典，收藏、鑑賞書畫與古器物蔚成風。宋代極文史之巔峰，尚享有傳播工具便利的效益，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，使得各類書籍得以迅速刊佈，圖錄的印製促進文人之間的交流與考究。宋代大環境提供的各項有利條件下，文人對於青銅器銘文和器形的研究，結合金石學的熱絡氛圍迅速發展。在缺乏攝相技術的時代，金石著錄的表現仰賴器物繪圖和拓印功夫，北宋呂大臨撰錄的《考古圖》，以及宋徽宗敕編的《宣和博古圖》，為古器物圖錄的劃時代先聲。

清代考據學、訓詁學以及文字學的興盛，一方面承繼宋代的金石遺緒，隨著陸續出土的青銅器，文人學者面臨大量的新材料時，舊有的傳拓銘文和摹繪器形，已無法應付研究者、收藏家的需求。尤其是自宋代以來的金石著錄，對於器物的形制和紋飾擬真度不夠，在此背景下，全形拓的工藝應運而生。



圖十 毛公鼎全形拓 善本軸裝 拓裱縱235，橫91公分 陳介祺舊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

形拓作品為各家爭相收藏。青銅器全形拓的製作與收藏風氣，一直延續到了清末民初，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輩出，若以收藏角度而言，以劉體智（號善齋，一八七九—一九六二）的質、量俱精，最富盛名。善齋當時合作的拓工為王秀仁，所作全形拓多鈐有「王秀仁手拓金石文字」。劉體智於一九三二年將《善

齋藏器全形拓》共四百三十件，捐贈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藏於傅斯年圖書館。（註三）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全形拓超過一千兩百件，其中的精品名拓，原器現多典藏於故宮，若將器物與全形拓並而觀之，一方面既能見全形拓的工藝與巧思，對於青銅器物本身而言，形制特色與紋飾重點也更為突出。（圖四～九）

### 清末民初學者與收藏家形成的網絡

曾經收藏《毛公鼎》者，皆深知鼎內所鑄銘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，於是渴望透過與文人交流，一窺堂奧。收藏者中，陳介祺、葉恭綽、陳詠仁皆曾找人為《毛公鼎》製作拓片。（圖十）當時這些拓片不僅擔任《毛公鼎》的「分身」，經過散佈傳

全形拓出現於乾嘉時期之後，又稱為器形拓、立體拓、圖形拓。全形拓主要以傳拓為基礎，結合素描、繪畫、剪紙的技法，試圖在平面的紙上，呈現青銅器的立體全貌。全形拓又依剪裁、拼貼與否，分為整紙拓與分紙拓，整紙拓的功夫較為困難，需根據銅器部位分段上紙、上墨、挪移。另外，也有分紙拓搭配版畫翻刻拓，方法較為靈活便利，但卻不如整

紙拓的器形傳神逼真。曾經收藏毛公鼎的陳介祺（號篁齋），為清末著名的金石學家，曾任翰林院編修，喜好收藏古文物。篁齋收過許多珍貴的青銅器，且培養多名拓工，長期大量製作拓片，除了自己珍藏，也與吳式芬、潘祖蔭、吳大澂等人交流意見，並將傳拓技法鑽研所得，編成《傳古別錄》，另有《篁齋金石文考釋》、《篁齋尺牘》等作。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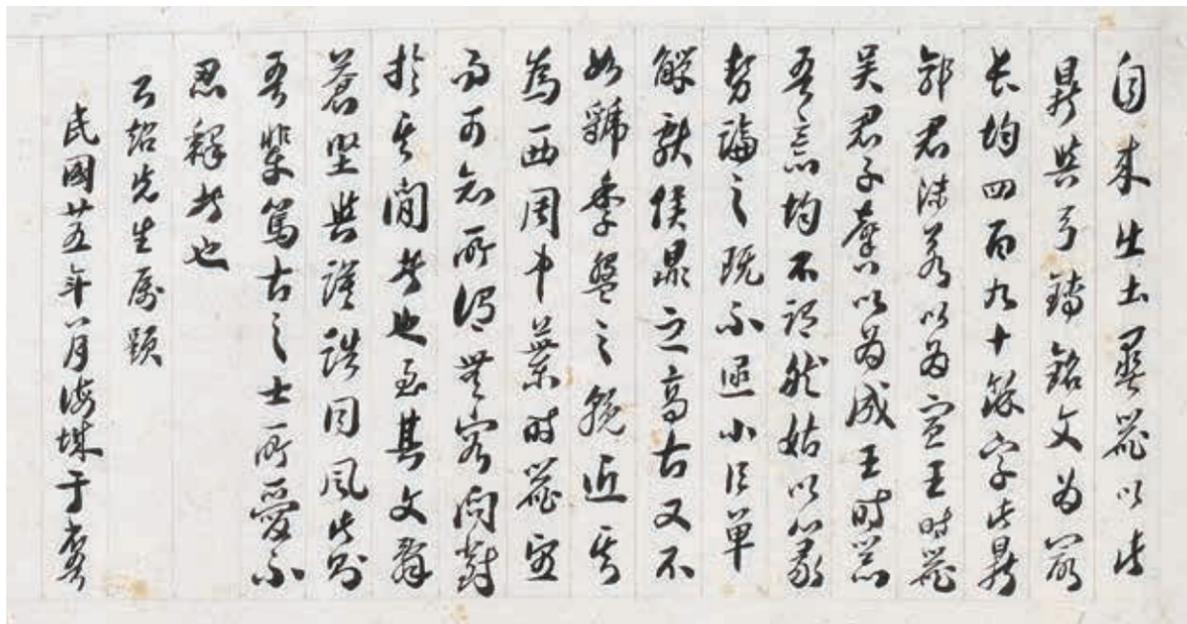
陳介祺形成的文人圈，成為促進全形拓發展的重要動力。將全形拓工藝推向高峰的，還有名拓工周康元（字希丁、西丁，一八九一—一九六一），為了追求更精確傳神的作品，積極學習西方繪畫的透視技法，所拓器形立體鮮明之外，紋飾細節也都分毫不漏、栩栩如生。周希丁親拓過許多名器，包括羅振玉、陳寶琛、故宮武英殿和寶蘊樓所藏的青銅器，流傳的全



圖八 春秋早期 魯伯大父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魯伯大父簋全形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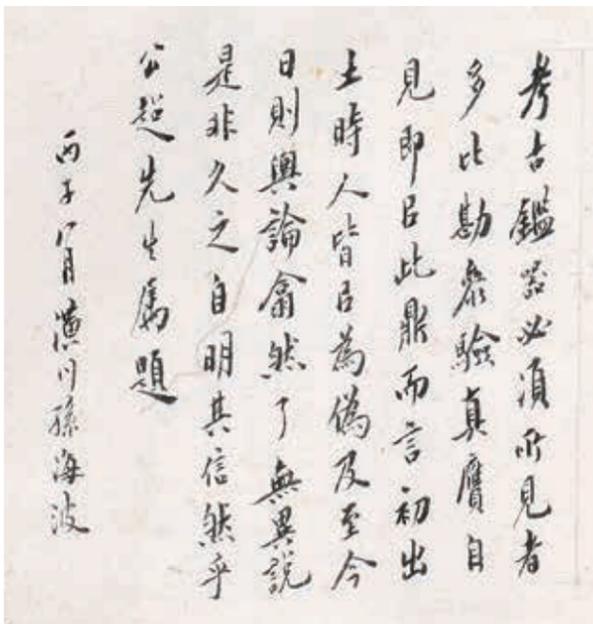
圖十一 毛公鼎全形拓 于省吾題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遜，拓片旁的題記也留下學者專家的見解，標誌著當時鑽研金石的文化風氣與學術發展。

院藏〈毛公鼎全形拓〉的五則題記，除了記錄〈毛公鼎〉的流傳史與研究史，也可見當時青銅器研究的焦點與演變。舊有的金石傳統與經典訓詁，結合新興的出土材料，發展為古文字學，為下一個世紀的歷史視野注入泉源，受葉公超邀請撰寫題記的五位學者，正是皆屬於這個時期的代表性人物。

依題記書寫時間順序，最早的為于省吾及孫海波。于省吾（一八九六—一九八四），字思泊，號雙劍謬主人，遼寧海城人，著有《雙劍謬古器物圖錄》、《雙劍謬吉金文選》、《甲骨文字詁林》以及多種群經考究書籍。于氏的題記內容為：

自來出土彝器，以此鼎與弓鐔銘文為最長，均四百九十餘字。（註四）此鼎郭沫若以為成王時器，吳君子馨以為成王時器。吾意均不謂然。姑以篆勢論之，既不逮小臣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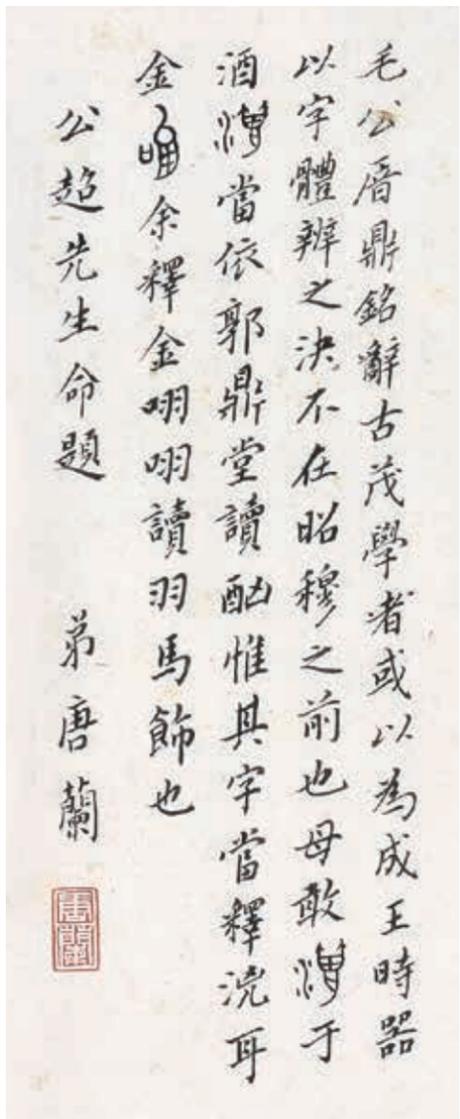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十二 毛公鼎全形拓 孫海波題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並出。孫海波描述〈毛公鼎〉「初出土時，人皆以為偽」正巧真實地呈現當時的環境氛圍，以及青銅器知識尚未成熟的状态，記錄了〈毛公鼎〉曾經身分的驗明，由偽至真的論辯過程。

唐蘭（一九〇一—一九七九），字立庵，浙江嘉興人，著有《殷墟文字記》、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、《古文字學導論》等。唐氏題記內容為：

毛公盾鼎銘辭古茂，學者或以為成王時器。以字體辨之，決不在昭穆之前也。毋敢謂于酒，毋當依郭鼎



圖十三 毛公鼎全形拓 唐蘭題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解、獻侯鼎之高古，又不如虢季盤之較近。其為西周中葉時器，望而可知，所謂無容問對於其間者也。至其文辭蒼堅，與謨詰同風。此為吾輩篤古之士所愛不忍釋者也。公超先生屬題。民國廿五年八月海城于省吾。（圖十一）

于省吾開首即指出，〈毛公鼎〉的價值在於其銘文的長度，若以銘文字體分析，他認為〈毛公鼎〉的年代當約為西周中期。內容典雅古奧，與尚書謨詰類文獻可相參照，使得研讀古書經典者如獲至寶。

孫海波（一九一一—一九七二），字銘思，河南光州人，著有《甲骨文編》、《中國文字學》等。孫氏題記內容為：

考古鑑器，必須所見者多比勘參驗，真贋自見。即以此鼎而言，初出土時，人皆以為偽。及至今日，則輿論翕然，了無異說。是非久之自明，其信然乎。公超先生屬題。丙子八月潢川孫海波（圖十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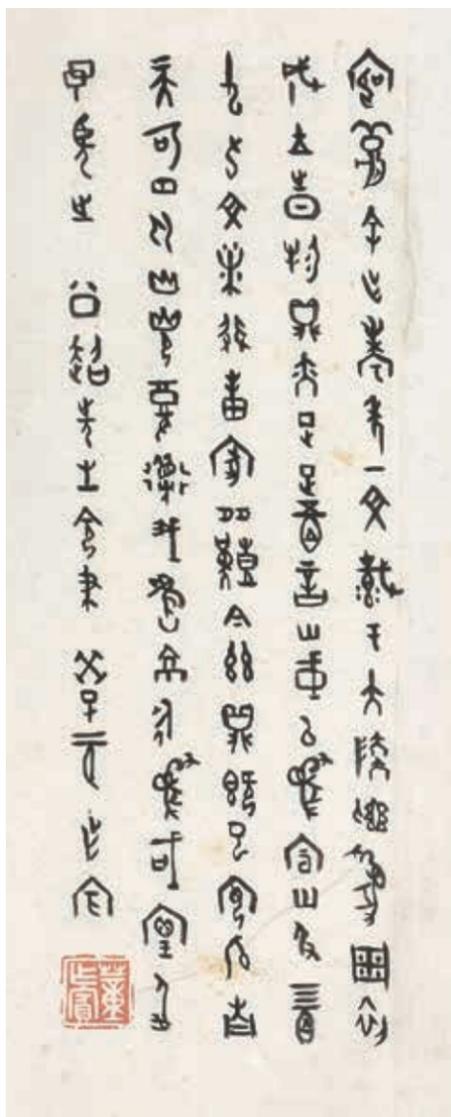
當時器物多非考古出土，收藏家、商人私自買賣，真偽器一時紛雜

堂讀訕。惟其字當釋沈耳。金鼎，余釋金明。明讀羽。馬飾也。公超先生命題。弟唐蘭。（圖十三）

唐蘭尤精於考釋銅器文字，他認為以銘文字體判別，〈毛公鼎〉的年代當不在昭穆之前。並對銘文中的幾個字詞加以隸定釋文，可知這些字在當時未有定論。題記中對〈毛公鼎〉銘文的積極判讀，也可見文人學者於古文字考釋的嘗試。

容庚（一八九四—一九八三），字希白，號頌齋，東莞莞城人，著有《金文編》、《商周彝器通考》、《頌齋吉金圖錄》等。容庚題記內容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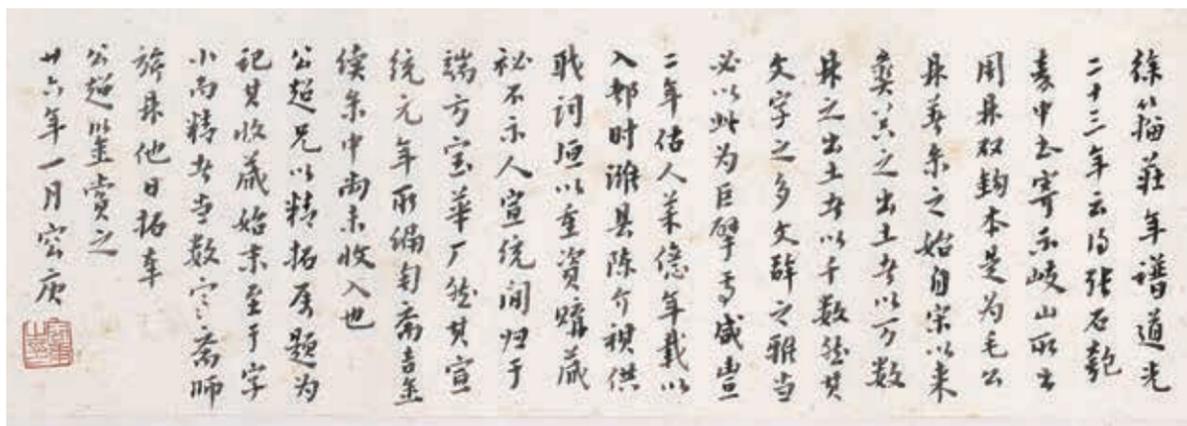
徐籀莊年譜，道光二十三年云：得張石匏秦中書，寄示岐山所出周鼎雙鈞本。是為毛公鼎著錄之始。自宋以來，彝器之出土者，以萬數。鼎之出土者，以千數。然其文字之多，文辭之雅，當必以此為巨擘。于咸豐二年估人蔡德年載以入都。時濰縣陳介祺供職詞垣，以重資購藏，秘不示人。宣統間，歸于端方寶華庵。然其宣統元年所編匱齋吉金續錄中，尚未收入也。公超兄以



圖十五 毛公鼎全形拓 董作賓題記  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為清末民初著名的金石學者，精於古文字的考釋，可謂文人圈裡的一時之選。拓片上的題記也可見由器物、金石拓片形成的學術網絡，不但記錄了〈毛公鼎〉的流傳過程，往來之間還增進了對於青銅器的認識。〈毛公鼎〉從道光年間出土，歷經輾轉收藏，至民國二十五年，于省吾等人撰寫題記，描述對於〈毛公鼎〉的認識，可說是這約為一百年時間，青銅器和古文字知識的積累成果。

從宋代以來，至清末民初的文人，雅好收藏與傳拓青銅器，源自於嚮往儒家經典中的商周文化，青銅器



圖十四 毛公鼎全形拓 容庚題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精拓屬題。為記其收藏始末。至于字小而精者，當數寒齋師旂鼎。他日拓奉公超鑒賞之。廿六年一月。容庚。(圖十四)

清末民初時，尚無科學性的考古發掘，所見之青銅器多為傳世器，或偶然因農耕闢土而問世，甚有盜掘出土者，對於青銅器的辨偽知識仍在建立，自然發展出對於器物「流傳有緒」的考證，因此容庚詳細說明〈毛公鼎〉的收藏過程，反映了時代的學術需求。

器拓右方為董作賓的甲骨文書題記，作於民國四十二年，為年代最晚的題記。董作賓(一八九五—一九六三)，字彥堂，一字雁堂，號平廬，河南南陽人。為甲骨文研究的奠基者，主持安陽殷墟關鍵性的發掘，是中國現代科學考古的先驅。著有《殷曆譜》，主編《殷墟文字甲編》、《殷墟文字乙編》等重要學術鉅著。董彥堂題記內容為：

客秋余作者年一文，載於大陸(註五)，斷為周初成王時物，鼎亦正足五百言，世或以為宣世，及

四百九十七文者。非(悲)邦家多艱，今茲鼎既已安氏(抵)南天，何日河山光復，還我舊京，永為國寶，企予望之。公超先生命書。癸巳二月。作賓。(圖十五)

董作賓於民國四十一年，作《毛公鼎考年註譯》，由文字、用詞、禮制方面舉證，說明〈毛公鼎〉的年代為西周初葉。是時〈毛公鼎〉暫棲於台中庫房保存，董作賓任運台文物抽查委員會理事，曾數次手持目驗，彙集王國維、容庚等眾家之說，親自摹錄銘文，審訂註解，作釋文和譯文，對於〈毛公鼎〉銘文通篇，有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。院藏〈毛公鼎全形拓〉上，留有董作賓甲骨文題記的墨跡，可見一位研究者付出的心力，以及背後對於器物的濃厚情感。

### 結語

曾經收藏〈毛公鼎〉的葉公超，邀請于省吾等人所作題記，展現當時收藏家與文人學者之間的深厚情誼，並且依憑著拓片，提出自己的見解，互相交流的過程。撰寫題記的人，皆

如同搭載時光文明，可讓人憑古懷思。以往青銅器或珍藏在宮中，或深藏於民間私宅，文人只能轉而探訪古玩市場，但真偽器難辨，又所費不貲，因此拓片成了最佳替代品。全形拓出現的意義，在於對銘文的考釋，轉趨亦重視青銅器的整體形制與紋飾，展現清末民初金石研究風氣之鼎盛。現代博物館的建立，讓一般民眾皆能近距離觀賞青銅器，古玩需求自然不再熱絡。又照相技術普及，拓工凋零、技術失傳，全形拓也就漸漸消失。雖然〈毛公鼎〉已經公開展示，能滿足大家親近古文明的想望。但院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### 註釋

1. 張光遠，《西周重器毛公鼎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三。
2. 譚巨罔，〈毛公鼎的淺識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四〇期，一九八六，頁一一七—一二五。
3. 陳昭容、黃銘崇、袁國華，〈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〉，《古今論衡》第三期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，頁一五九—一七〇。
4. 「弓鑄」現在一般稱為〈叔尸鑄〉，相傳出於山東臨淄，曾著錄於《東書堂重修宣和博古圖錄》(一一〇七—一一一〇)、《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》(一一四四)等。按摹本字數共達四八〇字，另有重文六字、合文八字。原器今日未見。
5. 原載於《毛公鼎考年》，《大陸雜誌》第五卷第八期，一九五二，頁二五七—二六〇。〈毛公鼎釋文註釋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五卷第九期，一九五二，頁二九九—三〇五。兩文合成一冊出版為《毛公鼎考年註譯》，臺北：大陸雜誌社，一九五二。